
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素质

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素质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同时又是发展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人是一切发展的最高目标，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

从现代化的层面来看，人的发展是人口素质提高的过程。人口素质的高低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当然人口素质的提高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予以保证。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就是提高人口素质的保证条件。也就是说，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与人口素质提高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理解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口素质提高之间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协调并进的过程。

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目标是加快实现城市的现代化。在浦东的现代化过程中，浦东人口素质的状况是影响浦东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浦东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提高之间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关系。

1. 人口素质的界定

(1) 人口素质的内涵

人口素质，亦称人口质量，是当代社会学、人口学、人才学、未来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对这一概念的内涵界定，我们可以沿着历史的隧道，追溯到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思想。在这些思想家洋洋洒洒的字里行间，隐藏着绚丽的智慧瑰宝。在他们的行文中虽然没有“人口素质”一词的明确表述，然而其中阐述的有关人口与人口素质方面的丰富内涵，直到今天还对我们有所启迪。

古典经济学家配第在分析人口价值时指出，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于全部人口的自然数量，而在于人口的社会数量。他所讲的人口自然数量，就是人口规模，人口总数；而人口的社会数量，是指人口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他说：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能和许多人相抗衡。这里的技艺，显然包含了人经过后天的学习和社会的培训所获得的一种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他还认为，人口的价值不仅在于人口的自然数量，而且在于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人口的社会数量。人口的社会数量可以大大胜过人口自然数量。配第能在那个侧重人口自然数量的遥远的年代，提出人的“社会数量”这一概念及人口的社会数量要优于单纯的自然数量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除了配第，早期的资产阶级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也有许多关于人口质量方面的精彩见解。其中特别提到：人口数量的增多并不能与社会的财富增长成正比；相反，会引起人口过剩的危机，只有经过教育和掌握了

技术技能的人，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一些早期东方人口学家还进一步认识到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口过多，人均获得的食物就相对减少，生活质量就下降，而生活质量下降势必影响人口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因人口过多导致青少年的教育费用发生困难，进而遏制了人口的文化发展和导致受教育程度的降低。因此，社会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这种恶性循环的产生。法国思想家马布利还认识到人的生存质量与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指出，与其叫地球上住着无数的过野蛮和贫困生活的不幸者和奴隶，倒不如只有一百万幸福的人生活。“如果人们始终不曾建立私有制，土地会被人们种得最好”。显然，在马布利看来，在公有制社会，人们有足够的生活资料，会比私有制生活得更幸福。

以上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及对人口质量问题的探索，有些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了科学真理，有的对今天仍然有借鉴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的这些思想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大都只是零碎的，未能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与阐述；另一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某些观点难免夹杂着非科学或非客观的成分。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诞生及其发展，才科学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从而为我们今天更进一步深入研究“人口素质”这一课题，更深刻地领会其实质内涵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正确的立场、观点。同时，当代国内外理论界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富有创见性的研究和发展，又为我们的探讨带来浓厚的时代气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加深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产生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人口学，从总

体上说是一座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立论基础，吸取前人的理论精华，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人口问题上存在的种种状况，从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生产方式出发来阐述人口及人口质量问题。作为理论上的一个严密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质量观内涵极其丰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人口质量的状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明：“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短促，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①这说明阶级剥削的生产关系使得劳动人民体质恶化，智力下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列举了大量的事例来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人口质量的下降，指出只有优越的社会制度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才是提高人口质量的基本前提，同时人口质量的整体水平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促使社会正视和改善人口的综合素质。

第二，人口的质量就是人的“生理素质和精神素质”。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口质量”这一概念的定义性总结。他们认为，人和一般动物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一般动物只会消极地适应自然，而人类则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74页。

造自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生理素质和精神素质”这样的概念来说明人口质量的含义，指出这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恩格斯还从身体、智力、道德三个方面考察人的质量，并得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质量发展的局限性的结论。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又进而把人口质量具体化为人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三个方面，并作了详细的论述。

第三，强调人口质量对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指出，质量较高的劳动力，不仅可以比质量低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增强劳动生产率，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普遍富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学思想，并根据我国实际，把人口质量概括为德、智、体三个方面兼而有之；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在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必须实行劳动人民知识化，造就无产阶级庞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

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出所谓“民族素质”，就是“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效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① 他对青少年素质的基本要

^①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求是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他还从精神文明的内涵角度指出，提高民族素质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和教育体制一定要改革，要上去。“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①。他第一次把“民族素质”与“人才”、“教育”、“改革”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个课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有力武器。

关于“人口素质”一词的现代含义或者说定义，在当代的人口研究领域也一直是令人瞩目的探讨“热点”。

1979年版的《辞海》对“素质”的表述是：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是感觉器官特别是神经系统的特点。1992年版的《实用汉语词典》则把“素质”解释为“泛指事物本来的性质”。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定义也有不同的表述。其中较重要的观点有：①认为人的素质是指人和各种组织的内在品质、本质。人的素质是综合素质，其内涵可概括为德、智、体，德、智、体、美，德、智、体、美、劳等。综合起来，大致包括政治、思想、道德、知识以及气质、生理等方面。②一个国家的人口质量通常是指人口的健康状况、营养标准，以及劳动技能和胜任工作的程度。③把人类作为集团，它所具有的遗传素质、性质、性格、智能或者教育程度等各种属性，叫做人口质量。④广义而言，素质是指人的一种内在身心状态，尤其是这种身心状态所处的水准。它是一个由多层次、多侧面和复杂机制构成的综合体，一般可分为自然素质（即与生俱来的人的机体的某些生理状况或体质状况）、心理素质（由人的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

①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素所组成)、社会素质(即主体作为社会的人参与社会实践必备的能力,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法制素质等诸方面)。⑤人的素质就是人的意志、教养、修养、文化、品性在行为上的外化。

这些论点或定义都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人口素质”的内在含义。作为一家之言,我们把“人口素质”的含义理解为:一定历史阶段中,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口在质的方面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素质”的内涵被赋予日益丰富的层面。人们已日益认识到,当前国际间、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竞争,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素质的竞争。世界上有许多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其主要优势是人的素质的优势,这是“教育立国”战略的胜利。当前,人口素质问题已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重视国民的素质培养,已成为东西方国家的共识。

(2) 人口素质的特征

“人口素质”,就宏观角度而言,具有现实性、历史性、丰富性等几个显著特征。

(a) 现实性。

所谓现实性,就是指具有一定素质的人口是生活在特定地域、特定时间、空间的现实的人,而不是某种远离现实生活的抽象物。这就是说,我们在制定特定时期、特定地区人口素质标准系数或目标定位等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由于地区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地理环境的差别引起的人口素质基础的差异。由于这些现实因素的存在,民族间和人群间的文化基础、受教育程度、道德风尚、健康状况等必然是参

参差不齐的，因此人口素质标准在现实中是有弹性的。据有关资料统计，当代发达国家把人口生命质量系数（PQLI）作为衡量人口素质水平的一个标准，简称人口质量指数。其操作是把婴儿死亡率、一周岁时的期望寿命、阅读和写作能力等三个指示性数据结合在一起的复合指数。它实际上是指数值由 0 到 100。0 是人类的最低水平，100 是最高水平。根据这个指标来衡量，当代世界人口质量指数平均值为 65，发达地区为 92，发展中地区为 55，非洲为 58，拉丁美洲为 71，前苏联为 91，欧洲为 93，大洋洲为 86，北美洲为 95。从这些参考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相对来说，贫困地区的质量指数要比发达地区低得多。就我国来说，目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制定人口身体素质指标时就不能不切实际地把生命指数定得过高。在我国一些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生命质量指数还需定得低一些，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另外，在制定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指标时，还应考虑到知识密集型地区和文化边远地区的差别，教育程度发达与落后地区的差别，文明大城市与偏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差别。这是一项极其重要也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通过实践加以完善。

强调人口素质的现实性，还体现在，随着当今信息时代的来临及经济、科技的空前发展，人口素质问题已日益凸现出来，重视人口素质培养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从生产发展的趋势看，当代社会已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今后的经济建设，也将由硬技术向软技术，由机械技术向智能技术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有鉴于此，美国于 1926 年创办了全球第一

家以搜罗国内外高级人才为目的的“猎头公司”。此后，各国“猎头公司”纷纷成立，迅速发展。据美国一权威部门统计，全球“猎头公司”1994年税收总额已高达35亿美元，这充分表明政府对高素质人才的重视。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也相当重视大面积、多层面的人口素质整体水平的提高。提倡优生，禁止近亲结婚，发展医疗保健和文化教育事业，已成为政府机构日益关注的议题。有的学者甚至把人口、粮食、自然资源、能源、环境污染并列为当代世界“五大问题”，人口问题居于五项之首，而人口问题的基本内容就是人口质量和人口控制问题。

在我国，为适合现代化对中华民族素质提高的要求，从中央到基层，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已经投入到素质构筑的系列工程之中。一门新学科——质量人口学正在构建之中。

(b) 历史性。

“人口素质”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生理素质和精神素质也在不断发展，人口质量在不断改善和提高。另外，所谓历史性还指衡量人口素质优劣的评估标准也是相对的具有历史性的。

人类初期，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工具的落后使人们过着刻树记事的日子。那时社会衡量其社会成员素质优劣的标准只能是强健的身体和基本的谋生能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成员逐渐意识到仅有强健的身体和简单的谋生能力已不能满足日益复杂、日益精细的社会劳动，只有具备一定的生产技能或生存专长，才能立足社会、延续后代、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社会对成员的素质要求就逐渐扩大到文化、技术、优生、禁止近亲结婚等范畴。

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壮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转机。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缺陷，社会对人口质量的需求呈现出一种复杂矛盾的状态。一方面，随着机器大工业的诞生和社会再生产的扩大，社会迫切需要大批掌握了科学技术和生产技能的熟练劳动者，以及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园艺师、教师、会计师……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抑制了这种需求发展的可能性，甚至造成人口质量的逆向下滑。在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恩格斯运用亲身调查的材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在身体、智力、道德方面的水准日益下降的情况；揭露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如何摧残着工人的健康，使工人寿命短促、文盲众多，甚至道德低下、犯罪增多。同时，工人阶级自身意识的不断觉醒、不断的反抗斗争又迫使资本家为维持资本的不断增值及稳定的生产秩序，不得不从长远考虑投入资金的一小部分用作工人阶级教育、文化、健康费用的支出。资产阶级政府也为维护其统治，在国民预算中增加教育、培训、社会福利等投资，又使工人阶级的总体素质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就工人阶级自身而言，由于不断觉醒及先进思想意识的灌输，以及战斗锤炼后的成熟，他们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其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思想素质都跃上新的水准。然而，这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怪圈”控制下的经过痛苦代价和曲折道路换取的“进步”。就是这种“进步”，资产阶级政府也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它们不可能也不允许工人阶级的素质跃上更高的台

阶。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统治阶级从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繁荣出发，对劳动者的素质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等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毕竟限制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其衡量标准和评估标准都带有资本主义的特征。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政府对全体人口的素质给予自觉的关注和极大的重视。我国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的综合素质有了迅速提高。然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受经济、科技、生产力水平等因素限制，人口素质的衡量标准、评估标准等还必然带有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口素质将呈现高质量特点。在一个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人的智力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和淋漓尽致的发挥。因为除了用于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用于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以及用于同生产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于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之外，就是用来发展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保健等事业，从而保证了社会成员的素质塑造的物质条件和社会保障条件。

把握人口素质的历史性，有助于我们在现阶段牢牢抓住历史机遇。一方面珍惜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创造的一切有利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发达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和机会，努力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以人的高素质推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c) 丰富性。

人口素质是属于人口质量学的一个范畴。它包含的层面和研究领域的丰富和广泛是不言而喻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① 这一论断已被当代的实践所证实。自二次大战后直到今天的高科技时代，人口素质所包容的内涵日益多元化和深层化。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人类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和标准已不再仅仅停留在无疾病或只是躯体上的感觉良好。现代医学已要求国民从简单的追求长寿无病意识上升到追求人的生存、生活质量甚至死亡质量的改善等高、新层次；从单纯的防病治病转变到提倡一种积极科学的生活方式。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宪章的第一条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给健康下了这样的定义：“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充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这个深刻而全面的表述，把生物、心理、社会三者都包括在健康的定义本身之中，标志着人类身体素质的内涵有了更深层的含义和丰富的层面。由于人类知识总量的急剧增加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高、新、尖专业学科的异军突起，人的文化素质所包容的内涵也更加丰厚。据有关统计，世界范围内的科学论文、科技刊物数量指数呈逐年递增趋势。全世界每年发表的科学论文已达500万篇，登记发明创造专利超过30万件，出版图书50万种，其中科技图书25万种。今天一个科学家，即使昼夜不停地工作，也只能阅读他专业范围全部出版物的5%。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这种知识总量骤然膨胀的特点，使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趋向多元，知识覆盖面趋向丰满。有些学者因此认为现在对“文盲”的解释应该改变。未来的“文盲”将不是不识字，而是指不懂计算机语言或不懂外文。未来人类的文化素质已不仅仅凭一张十几年前获得的大学文凭就可以表明。因为当代“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人类使用石器时代约二三百万年，铁器时代有几千年，蒸汽时代不到200年，而电气时代则在几十年内就达到兴旺的阶段。“知识更新”的加快使人类原先的知识结构老化，同时涌现的一系列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又需要人类迅速掌握。于是，人的文化素质的内涵就不断丰富扩大。现代生产的发展引起人们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的极大改变，许多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给人们的精神、思想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思想素质的内涵增添了新鲜丰厚的现代内核。

“人口素质”，作为人口质量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它的丰富性还体现在广泛的研究领域。它涉及到人口质量发展的规律、人口质量的基本要素、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的关系、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体系、人口质量发展的阶段和类型等等。它还研究人口质量和社会、自然的关系，人口质量和道德、风俗习惯的关系，人口质量和文化思想的关系，人口质量和婚姻、家庭的关系，人口质量和遗传、优生、优育的关系，人口质量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关系等等。人口素质内涵的丰富性预示着人口质量学这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并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3) 人口素质的构成

关于人口素质的构成，有不同的划分。国内有学者把人

口素质划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三大部分；也有人把它划分为生理素质和精神素质两大部分；也有人按照马克思的划分方法，把它归之于人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三大部分。不论如何划分，其构成的框架组成差异不大。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虽然框架组成部分大同小异，但每个部分所包容的实际含量却是随着时代和生产的发展在不断地充实或剔除。另外，如果我们作一立体式的框架处理，对人口素质的构成，就可以划分为横、纵两个切面。横切面即人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纵切面可以划分成人的个体素质、综合素质、群体素质等等。

(a) 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考察一个社会或地区的人口质量时，首先遇到的是人的身体、营养状况、健康程度等方面的调查项目。

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主要因素为先天条件和后天获得两个方面，或者说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结合。

先天条件主要是指人类同其他生物都共同具有的遗传性能。这种遗传性能首先决定一个婴儿呱呱堕地后的自然身体状况：是健康还是体弱？是智力正常还是偏差？是体型合格还是有畸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祖先开始意识到近亲婚姻和血缘婚姻给后天身体素质带来的苦难和危害。“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民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

才能的程度”。^① 于是“自然选择”逐渐被“人为选择”所代替。人类血缘亲属之间的群婚、对偶婚逐渐被完全排斥了血缘关系的一夫一妻制所代替。这样，人类在改善和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方面跨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推移，人类在禁止近亲结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开展了以受孕选择、胎教、畸型儿预测等为主要内容的优生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人口身体素质的后天因素，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主要是人口出生后营养状况、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和劳动保护等等。这些因素在决定人口身体素质的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现代医学业已证明，即使个人的先天体质属于弱型，但如果他能在后天注意保养，加强锻炼，加以适当的营养，也能达到身体素质合格的各项指标。这是指人的主观努力程度决定或改变自身的体质状况而言。从社会角度来说，人类的身体素质状况与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连维持自身生存和再生产的能力都相当困难，更谈不上其他后天因素的获得；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生产力水平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但生产方式的缺陷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了少数富裕阶层身体素质的优化，而大多数工薪阶层和普通劳动者仍然在居住环境、营养供给、卫生条件、健身设施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而未能更好地改善自己的身体素质，甚至恶化或退化。据资料记载，1842年的危机造成整个苏格兰的穷人有1/6患上伤寒，然而整个生活富裕、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1页。

养良好的中上等阶级却安然无恙。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比其他各阶级的平均寿命大为缩短。1840年，利物浦的上等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5岁，手工业者是22岁，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据曼彻斯特市的一个统计资料记载，婴幼儿在5岁以前死亡的，其中工人的孩子约占57%以上，而上等阶级的孩子只有20%。此外，过度劳动和劳动条件的恶劣又使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明显退化；童工现象造成大量未成年少年发育不良和寿命缩短。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善了上述状况，但从社会横切面看，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身体素质现状呈宝塔状，处于宝塔尖的是占人口比例极小的上等阶级或政府官员，以下依次是中等收入者、私营主、白领工人、城市贫民、蓝领工人、失业工人……而在我国，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社会财富还很充裕，但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在三个方面保障了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水平。第一，党和政府对劳动者身体素质的极大重视和关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增强人民体质，并把“身体好”放在“三好”的首位。建国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采取各项措施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并控制了肺结核病、小儿麻痹症、破伤风、麻风病等的发病机率。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还拨出巨款用于扩建医院，健康体检、改善医疗条件等等。在极短的时间内，我国就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并已经以一个体育强国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二，我国劳动者的健康还受到来自党组织、工、青、妇、街道、社区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怀，使劳动者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

舞。这种良好的情绪对周围的人群氛围可以起到一种连锁扩散作用和激励作用，有利于促进劳动者的身心健康。第三，人口的健康医疗支出在国家预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国家从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出发，在劳动条件、劳动防护、妇女“四期”保护、工作环境、环保卫生、劳保福利等方面都有相应的措施。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国家会在各项预算中进一步增加这方面的支出，从而能在财力、物力上充分保证国民的基本医疗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

(b) 思想素质。

人口的思想素质，通常包括人的政治、思想、心理、道德、品性等几大层面的立体性展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学思想，这些内涵提示我们四个基本点。一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是一个动态的、变量的范畴，不是永恒的、终极性的原则或模式。认识到这点有助于我们运用发展的眼光认识和探讨人口思想素质的历史性变化，防止僵化和形而上学。二是在同一个社会生产方式内，由于各阶层人群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其人生观、价值观也不同。有时甚至同时并列着几种互相对立或互相排斥的思想意识形态，但往往有一种起着统治的、主导的地位，或称社会“主流思想”。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三种道德观：过去时代延续下来的各种类型的宗教道德，现代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一般说来，社会的“主流思想”总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或在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道德观和世界观。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表现为资产阶级道德及其意识形态占据上风。三是一个